



# 跃上人生新高度

中原农民出版社

# 跃上人生新高度

共青团河南省委宣传部

中原农民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这本报告文学集选编了十三篇生动感人的典型事例，再现了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我国青年一代的风采。他们之中有五十年代支援新疆建设的团中央干部的业绩，有真正牧马人谈理想和追求的娓娓叙述；有来自老山前线英雄的感人报告，有个体劳动者为群众无私贡献的赞歌；有革命年代的英雄，有今天青年的榜样……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向读者展示了宽广的胸怀，美好的理想，不屈的追求，在与今天青年心灵的撞击中，必定会爆发出精神的火花，青年同志会从中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受到美的教育。

### 跃上人生新高度

共青团河南省委宣传部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许昌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12.5千字

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0册

统一书号7394·1 定价0.80元

# 理想——人生的航标

## (序言)

郭国三

团省委宣传部编辑的《跃上人生新高度》一书，是一本生动的人生教科书。

一个人经过童蒙初开到达青年时代，是进入选择生活目标和人生道路的重要阶段。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理想追求，每个青年都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希冀在创造和成就事业的同时，得到爱情、家庭的幸福，获取物质和精神的享受，品尝劳动和创造的甘甜。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是，人生之路并非完全是一条铺满阳光和鲜花的道路。“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想象的那般浪漫”（《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83页）。实践证明，一个人只有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能不断克服前进途中难以预料的各种曲折、困难，永远保持不懈进击的勇气和正确的前进方向，实现人生价值，使青春放出光华。特别是作为八十年代的青年，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肩负着为祖国富强、人民富裕而奋斗的崇高使命。因此，每一个青年自己应该确立什么样的理想和目标，该怎样投身于火热的生活，怎样把个人的理想同祖国的振兴，同人

民的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去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本书主人公的生动实践，已经做出了最坚定的选择和回答。

理想——人生的航标。当你捧读《跃上人生新高度》这本书时，你会深切地感受到，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激励下，南疆英雄臧雷和战士们为祖国甘洒热血、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曲啸同志对党竭尽忠诚，受冤屈而无怨言，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的博大胸怀；个体青年幸福强在生命的短暂逗留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风亮节；还有我省献身畜牧事业的大学生张海泉、伊川女杰姜麦鲜、平顶山英雄群体的模范事迹。这本书所记录的英雄事迹是一曲曲充满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人生赞歌，是时代精神的强烈折射。不少篇目，催人泪下，感人肺腑。它既是当前我们进行理想纪律教育的好教材，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人生教科书，希望各级团组织要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团员青年认真阅读，开展向英雄学习的活动，激发广大青年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可以相信，学习这些英雄模范事迹，能使每一个正直坚定的炎黄子孙产生激越向上的情感，能帮助我们确立革命的人生航标，鼓舞我们战胜人生征途上的艰难险阻，勇敢地走向胜利的彼岸。

# 目 录

|                    |              |
|--------------------|--------------|
| 序言 .....           | 郭国三          |
| 拓荒者的足迹 .....       | 樊 和 ( 1 )    |
| 一个真正牧马人的自述 .....   | 曲 啸 ( 17 )   |
| 同代人在召唤 .....       | 郭梅尼 ( 34 )   |
| 跃上人生新高度 .....      | 马役军 ( 48 )   |
| 理想的航船 .....        | 郭梅尼 ( 64 )   |
| 新时代大学生的信念和追求 ..... | 林建刚等 ( 82 )  |
| 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 .....   | 孙葆森等 ( 87 )  |
| 胡杨泪 .....          | 孟晓云 ( 99 )   |
| 王维纲同志在狱中 .....     | 李之琰等 ( 120 ) |
| 战士万岁 .....         | 李伟中 ( 134 )  |
| 最宝贵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 ..... | 杜淑敏等 ( 150 ) |
| 伊川女杰 .....         | 姬 英 ( 154 )  |
| 四十分钟的激战 .....      | 聂世超等 ( 163 ) |

## 拓荒者的足迹

樊 和

春天，一九八三年的春天，从绿树繁花的江南扑向祖国的西北角，投进乌鲁木齐的怀抱。绿色的春风，在白杨、垂柳的树梢上，轻轻地落脚、发芽，无数颗种子，乘着杨花柳絮随风飞舞。

五月的一天，翻着浆的路上，开来一辆轿车，飞快地驶进了乌鲁木齐市南郊的延安宾馆。几位中年人，满面春风地跳下车来，急匆匆地进了一幢客房。

他们是谁？为什么这样匆忙？

二十多年前，就是他们，先后离开团中央机关，自愿报名来到新疆。此刻，他们焦急地坐在沙发上，等待着同当年的老领导、今天的党中央总书记，叙叙旧，谈谈心。

“来了多少位同志呀？”门外传来耀邦同志略显沙哑的声音。他，刚出访南斯拉夫归来，身上还披着亚得里亚海的风尘。虽然日程表以分秒计算，他还是要挤掉些休息时间，见见他们，见见这些曾经一起工作，后来离开他远走高飞的小鬼。快三十年了，他还想着他们。

大家围坐在耀邦同志身边，谈开了家常。有人说起，当年一块来新疆的同事，有的抱上了孙子。

“噢，有了第三代了，开花结果了嘛！”耀邦同志站起身来，兴奋地挥动着叉开五指的双手：“还是那句老话，大丈夫志在四方嘛！”

听到“大丈夫”，一位方脸盘、红脸膛的汉子会意地笑

了，心里说，是那句老话，你当年说的是“好男儿志在四方”。他叫王书龄，是自治区农业厅办公室主任。

## 大 丈 夫 志 在 四 方

说起志在四方的大丈夫，王书龄是当之无愧的。一九五五年九月，从北京出发到新疆的那天，他当新郎官还不满一天哩！然而，象这样的事儿，在那个年代又有什么新鲜呢？那是多么火热的年代啊！

是的，五十年代，是龙腾虎跃的年代，翻天覆地的年代，英雄辈出的年代。中华民族的儿女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刚刚把病弱的祖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沼中举援出来。翻了身的人民，那样热情，那样团结一心；人民共和国，那样年轻，那样充满生机。“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一九五五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祖国在召唤——开拓大西北，新疆需要建设者。消息传来，团中央机关的干部动员起来了，中央机关、国家机关的年轻人动员起来了，申请书、志愿书，象雪片一样飞来。这种景象不仅出现在北京，也出现在全国各地。党的需要，祖国的召唤，就是青年的志愿。——这是那个时代难忘的特征。青年们象紧绷在时代的弓弦上的鸣镝，只要党的号令一下，他们就会呼啸向前。

王书龄，当时在团中央搞基建工作，他正在团中央新办公楼的建筑工地上。工程由北京市某建筑公司承担。王书龄精明强干，作为甲方——团中央的代表，他的才能得到了乙方的赏识。那时候，那儿不缺干部呢。于是，一纸商调公函从北京市委组织部转到了团中央机关。

伯乐能相千里马，好小伙儿也逃不出姑娘的慧眼。有心人



发现，建筑公司的团干部马玉英（后改名为马辉），看上那个团中央的小伙子了。

自愿报名去新疆，当然少不了王书龄。可是，任凭他使出浑身解数，软磨硬泡，领导就是不批准。眼瞅着出发的日期迫近，王书龄展开了最后的争取。

禁不住猛烈的攻势，领导不得不向他摊牌：

“北京市急需干部，点名调你。”

“不！新疆我去定了。”王书龄脖子一梗。

“首都也需要建设。”

“边疆更需要！”

“那么……”领导神秘地一笑：“人家小马怎么办？”

咦？领导怎么知道的？王书龄搔了搔头皮：“没想，先去了再说！”

“这不是开玩笑……”领导略一沉吟：“好吧！你要去，先结婚再走。”

“行！只要她乐意，明几个结也行。”

洞房花烛夜是甜蜜的，又是短暂的。婚礼的第二天，告别了一日妻子，带着百日恩情，王书龄——这个大丈夫，走了。

几乎同时，一份公函从团中央转到了北京市委：请求调马玉英同志到团中央。她，所在单位没有援疆任务，到团中央，是为了随后续部队，去追新郎。

王书龄是幸运的。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团中央机关有三十多位同志先后支援新疆。当然，报了名却领不到支边签证的，毕竟是绝大多数，有多少人望着西去列车哭鼻子，就难以数计了。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八日上午八点半，北京前门火车站一片喧腾，中央机关支援新疆的第十四批建设者出发了，这一批有

十二名团中央干部。转动的车轮打着拍子，车厢里飞出他们的歌声：“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吧，妈妈！再见吧，亲爱的故乡……”

### “我是来吃苦的”

不到新疆想新疆，到了新疆，有个人却“后悔”了。

他叫杨发仁，是团中央保卫科长。一九五七年春天，一只藤箱，一卷行李，装着他的理想，到了天山脚下。他记着少奇同志的嘱托：你们为什么去，因为那里艰苦，那里需要增加革命的因素，你们要做革命的种子。

是种子，就要到泥土中去生根。他的志向是当个拓荒者。没料到，他被分配在团区委，不久又调到区级机关团委。万里迢迢，难道是为了坐办公室？

他贴出大字报，要求到戈壁滩上当一个农民，他说“我是来吃苦的！”他的申请被批准了。

十月十七日，他到吐鲁番牙耳湖乡青年团合作社当了社员。当时，他结婚刚一个月，新娘叫田树英，也有一副火热的心肠，放着团中央医务室的听诊器不拿，非到乌鲁木齐当小学教师不可。

当手臂被葡萄藤划出的几十条伤痕换来八个工分的时候，他是那样兴奋；夜里，在葡萄园浇水，当社员阿不列孜把自己的皮大衣披在他发抖的肩膀上的时候，他是那么激动……

他在十一月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午，坐在地埂上吃高粱面饅（一种烤制而成的饼，一般用面粉做成），又厚又硬，啃一口留下一个血印子。可劳动后吃什么都是香的。我正贪婪地吃着，忽然发现吐尔逊瞪着我。原来，我把饅屑洒了一地。热合买提说：‘那块地明年要长高粱了’，羞得我脸通红……”

他象一只蚕，在吞食着桑叶，也在吐丝。他的卧室，成了青年们学文化的小课堂；他为乡亲们看病送药，成了社里的土郎中；积肥时别人嫌臭，他挨家挨户淘厕所；社里有急活，他倡议成立青年突击队；……

戈壁荒芜，法纪观念也很淡薄。合作社的会计和出纳合伙贪污，同上边有瓜葛，乡亲们敢怒不敢言。他明察暗访，几个通宵，把问题搞清楚了，官司打到县上，赢了！两个贪污犯被判了刑。

这下，乡亲们象过年一样高兴，郑重地给他起了个维吾尔族名字：牙合甫——就是圣人的意思。年迈的回族阿訇，虔诚地劝他入教；乡亲们选他当副社长；党员选他担任副支书；选人民代表，数他票多。

在社员的欢声笑语中，在一年多的社员生活中，杨发仁悟出了一条真理：群众眼里的圣人，不一定是菩萨，只要能为群众救苦救难；我们党里这样的人多了，还愁人们不跟着党往前奔吗？

一九六三年，他当“官”了，担任了区级机关团委书记，职别是副县级。一九六五年底，组织上决定调他担任正县级的职务。然而，拓荒者自有拓荒者的志向，他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请调报告，要求到托克逊县最困难的公社去工作。

他为什么要到托克逊去呢？

一九六四年，杨发仁在托克逊搞社教。他痛心地发现，解放十多年了，这里山河依旧。人民不再受老财、头人的气，却仍然在受大自然的气，受国家工作失误的累。他忘不了，一个姑娘身上那露肉的翻花破棉袄；他忘不了，一位维吾尔族大娘胳膊上挎着的要饭篮子……

他再一次如愿以偿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他被派到托克逊县红旗公社担任党委书记。这回，他把父母、妻子、两个小孩连锅端了下去。

从首府到托克逊，职务上：丢掉大城市里的县级待遇，到戈壁滩上去当基层干部；经济上，地区补贴差价，将使他们夫妇每月少收入三十多块！然而，杨发仁想的是：“我是为人民不吃苦才来吃苦的！”

他怀着创业的渴望来到托克逊。他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到祖国母亲的身上……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一个晚上，在托克逊县城，杨发仁一家无家可归了。朔风咆哮，好象要把父母、妻子、孩子和他，横扫出这个世界。瑟瑟发抖的孩子依偎在他胸前，背后的门板上，斜贴着一张勒令：“限三日内滚出县城”。茫茫戈壁，杨发仁举目无亲，一家老小投奔何方呢？

远远地，朦胧的夜幕中出现了几个人影，公社干部克叶木和社员们来了。他们帮杨发仁在两间窑洞里安了家，这是社员买合买提刚刚为他腾出来的，这土坯窑洞原不是住人的，四面透风，象是筛子搭的。杨发仁一家发愁地挤在一块，坐了半宿。

第二天一早，东方天际又出现了久未露面的玫瑰色朝霞。克叶木领着十几个社员，提着砍土曼（当地农具，形似锄头），抱着麦秸来了。他们打碎冻土，化开水，拌上麦草，三下五除二，把两间窑洞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抹了个严严实实。一把火，从炉膛钻进火墙，钻进杨发仁的心里。

台风中心，往往会留下一块风平浪静的海面。几个月来，县城和公社，对杨发仁简直是两个世界。

县城：他是走资派，戴着黑五类的帽子；

公社：在同一时间里，他是党委书记，掌握着巨大的权力。

县城：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的一天，他头顶高帽，脸涂炭黑，被造反派押着游街；

公社：半小时后，他洗了把脸，召开干部会，研究备耕。

县城：三月，造反派勒令他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检查；公社：在同一时间里，他写出的，是红旗公社棉花生产总结……

对一个走资派，红旗公社的乡亲们为啥有这么深的感情？

乡亲们不会忘记，头年二月，从首府下来的这位三十岁上下的白面书生。人们奇怪地看到，新党委书记的“办公桌”会走在关内，亩产百斤皮棉不算拔尖儿，可红旗公社才半百挂零。他从这家的地坑，到那个队的地头，他找老农请教，蹲在地头看棉苗长势，捏土疙瘩，找低产的病根。他当着中心县委书记李嘉玉的面夸下了海口：“今年亩产要三位数。”

为了这三位数，为了推广新植棉方法，他跑遍了公社每一块棉田，着了魔似地去田里一蹲就是半天，时而薅去几棵杂草，时而目不转睛地盯着棉枝上每一个凹凸的地方，看是不是要挂蕾。

一天，李嘉玉把他喊了去：“你那个三位数有把握吗？”

“有！”

“先别吹，你根据啥？”

“每株苗伏前桃平均两个以上！”

“还有呢？”

“我搞了负责制，建立了棉田专职管理小组。”

“好，不听了，秋后见！”

秋后一算帐，全公社皮棉平均亩产一百零三斤。要不，杨发仁干嘛顶着走资派的帽子，写那份棉花生产总结呢？何止是棉花，杨发仁和乡亲们苦斗一年，换来了沉甸甸的秋收。

这一年，在政治风暴中，红旗公社阵脚不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与上年相比，粮食增产二成三，棉花增收七成二，人均收入增加三十元。当乡亲们挑着水桶去分油的时候，怎么能忘了党委书记呢？

杨发仁，象一颗种子，深深地扎入泥土，专找苦吃。他不，应该说他们——开拓者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吃苦，而在于为了让群众不吃苦而吃苦。

## 扑不灭的信仰

是与非，黑与白，光明与黑暗，好象一夜之间都颠倒了。

他，林耕，十九岁参加革命，一九五五年离开团中央机关，向往着花团锦簇的前程，来到新疆；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工作；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他再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然而，一九五七年，他犯了“右派言论错误”；一九五九年，他被发配到“盲流收容集训队”工作，一九六一年，他又被开除公职和团籍……

他想不通，为什么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却被开除出革命队伍？为什么曾经推心置腹的同志，会信口雌黄，从背后插入致命的一刀？

他在马路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着，阳光穿过白杨树叶的缝隙，筛落在他的身上，那跳动着的图案，就象一个个问号……

几天几夜，他的大脑在翻江倒海。慢慢地，大海退潮，露出了金色的沙滩。他得出了结论：党会澄清事实的。他决定接受这个考验。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考验会这么长。

失去工作，两手攥空拳，精神上的苦闷不消说了，经济上的困难也接踵而至了。一家六口，靠他爱人七十块五毛六的工资过日子。清水白菜，虽说清苦，也还对付得过去，谁料想祸不单行，小儿子不满周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一张张医药费收据，使这个收支勉强平衡的家出现了赤字。不得已，停止了已见成效的治疗，可怜那孩子，成了终身残疾。

硬铮铮的汉子，怎么能同孩子抢饭吃呢？再闲下去，林耕心里会长草的。他要为社会做点贡献，要分担妻子肩上那捉襟见肘的经济重负。

他，开始学手艺了。他当过临时工，学会了修汽车引擎；看到人家修表难，他自己鼓捣着学，找不着工作，就义务为街坊四邻修表，虽说不赚钱，可心里踏实多了。

一九六四年，街道上看他老实，为他说了不少好话，介绍他进了一家修缮合作社当电工学徒。他心灵手巧，一点就通，不久也成了师傅。

一股家具风，顺着丝绸之路，从内地刮到了天山脚下。合作社里有的是木材、钢材，许多家庭的家具更新了，现代化了，而有些人的心却荒了。林耕有手艺，也有的是力气，可他连只小板凳也没有，拓荒者的心怎么能荒呢？

有人讽刺他：“党都不要你了，还摆什么酸臭架子。”

林耕的回答掷地有声：“我还不是党员，可我要对得起党。不是凭力气挣来的，白给也不要！”

“株连”的封建货色，在新中国的一段历史中，得到了出色的贯彻。

林耕的爱人杨艳秋，不相信丈夫会反党，她没有听让她离婚的劝说，象一头牛，忍辱负重，担着一家六口生活的重担。她受够了别人的白眼，听惯了墙旮旯里飘出来的冷风。

死心塌地当“右派”的婆姨，显然不适宜在公安局搞机要工作，她被下放到街道搞“向阳院”。她听丈夫的话，写了入党申请书，努力把林耕那份工作也干出来。可那年月，她要入党比登天还难啊！

林耕的大女儿张馨，象爸爸一样聪明。她记着爸爸的话，热爱党，听党的话。一九七七年，她插队所在的党支部，一致

通过她入党，报到上级党委，卡了壳；接着，她参加了高考，成绩过了分数线，却被关在太学校门之外。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有个不合格的爸爸。

当女儿向林耕哭诉这一切的时候，他的心都碎了，他怎忍心让女儿纯洁的心田里蒙上阴霾呢？他对女儿说：“他们不能代表党！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恢复正常人的尊严！”

他怎么能不相信党呢？是党，把他这个孤儿救出苦海；在西北团工委，在团中央，学习、实践，使他把向党报恩的朴素感情，上升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科学信仰。二十年冰封雪覆没有把他压垮、冻僵，这就是他的精神支柱。

冰雪毕竟挡不住春天的来临。一九七九年，林耕的沉冤彻底平反了。在女儿已经到了超龄离团年龄的时候，年近半百的林耕恢复了团籍，夫妇两人一起回到了市公安局。

林耕，还是当一般干部。有人觉得，林耕受这么多年冤屈，这回可有了讨价还价的本钱了。然而林耕并没有把职务、待遇放在心上，他觉得：最大的不幸是丧失了为党工作的宝贵时间，他拚命干了起来。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二年，他连续被评为局先进工作者。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林耕和杨艳秋在党旗下举起右手，呜咽着宣誓，那誓词的最后四个字是“永不叛党！”

## 在理想的荒原里开拓

草木难生的戈壁，很难开拓为绿洲；理想的田野若是拓了荒，就更难耕耘了。

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工作的库尔班·伊米尔和哈丽干姆·伊斯拉木夫妇，没有被自然界的风暴、政治运动的狂潮摧垮，却差点被四面八方袭来的不正之风吹倒。同许多地方一样，在他们周围，一些年来，克己奉公的传统被一些人丢掉



了，一些曾经为党忘我工作的同志，竟乘着不正之风，扬起个人主义的风帆，一种腐败的空气常常使他们感到窒息。

库尔班和哈丽千姆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到伊犁工作，有人说他们傻；哈丽千姆在乌鲁木齐是科级干部，甘愿到伊宁市当一般干部，一干就是十几年，而她在中央团校辅导过的学生担任了市委副书记，有人说她犯了错误：他们对领导不吹不拍，有意见就提，有人说他们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前些年调工资，他们两口的工资都是二十几年没动，可他们主动让给了别人；即便这样，也有人在背后嚼舌头，说他们沽名钓誉……

每当他们在同这种困难的搏斗中筋疲力竭的时候，他们就会想一只茶杯和一块手表，那茶杯和手表总是给他们以极大的力量……

那是一九五三年，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民族班毕业典礼上，库尔班和哈丽千姆被演讲者吸引住了。

“回去以后，你们会碰到很多困难、很多矛盾的。撞上了，怎么办？”会场里顿时热闹起来。演讲者霍地站起身来。他个子不高，眼睛里射出炯炯的光。他左手抄起茶缸子，右手抓起手表，当！当……矛盾、困难在手中撞击着：“撞上了困难、矛盾，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冲过去嘛！”说着，他噌地一下，从台上冲到了台下。这位演讲者，就是团中央书记胡耀邦。

耀邦同志回到台上，接着说：“冲，靠什么冲呢？我们请大家来，一没给权，二没给钱，这两样我们都没有嘛。我们给大家一个法宝，就是坚持原则，靠真理吃饭！”

这铿锵有力的话，在库尔班和哈丽千姆心中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